



高教动态

(半月版)

2014 年第 4 期

(总第 29 期)

嘉兴学院
规划与评估处 编

2014 年 4 月 15 日

目 录

● 高教时讯

教育部召开“985 工程”高校章程建设工作交流会.....	1
科研评价改革是今年高校科技工作重点.....	1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2
《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发布 商科就业难.....	2
上海公布年度本科预警专业名单 7 个专业被亮黄牌.....	2
重庆成立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盟.....	3
武汉地区高校及科研机构有了科技成果自主处置权.....	3
浙江将在高校推广“一站式”学生事务中心模式.....	3
上海交大自主研发的中文慕课平台正式上线发布.....	4
同济大学首个海外校区在佛罗伦萨启用.....	4
杭州师范大学将“慕课”引入正规教育教学.....	5
浙江中医药大学入选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5
浙江首所中美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获准设立.....	5

● 决策参考

有思想才能引领未来——被忽视的大学责任（上）.....	6
让学生具有真正的历史记忆——被忽视的大学责任（下）.....	8

● 高教视点

用科学理念主导大学章程制定.....	10
没了指挥棒 高校怎么办.....	12
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及运行机制的探析.....	14
社会服务，地方高校的边界在哪里？.....	17
工科教育再不“升级”就拖产业发展后腿了.....	20

● 教育评估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改了什么？.....	22
---------------------	----

● 他山之石

武汉科技大学：培养有“张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24
下放学术权力 让科研细胞活起来.....	26
辽宁科大：一所三线城市大学靠什么汇聚人才.....	28

● 国际视野

中美高等教育教学策略对比分析.....	30
---------------------	----



高教时讯

教育部召开“985工程”高校章程建设工作交流会

4月2日,教育部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985工程”高校章程建设工作交流会,交流高校章程建设所取得的进展、经验,深入研究分析形势与问题,旨在加快章程建设步伐,进一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高校章程建设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和紧迫任务。郝平指出,在高校章程建设已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对章程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

郝平强调,章程建设要从目标、程序和内容上下功夫,着力提高章程的质量。章程建设的目标要明确,要与高校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起到统领和推动改革的作用;章程建设的程序和方法要科学民主,围绕学校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深层次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制度设计;章程的内容要完备,具备核心要素,符合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体现高校自主办学、特色办学的要求。

郝平强调,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对章程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主管部门要以高校章程建设为契机,不断深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章程的核准程序,保证章程核准效率,提高核准质量。要充分重视和加强章程核准后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建设,保证章程核准后,在高校办学活动与改革发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4月3日,第3版)

科研评价改革是今年高校科技工作重点

“科研评价改革是今年高校科技工作的重点,要坚持分类评价、推行开放评价,通过评价导向和政策手段,将高校学者的兴趣和目标聚焦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上去。”4日在成都举行的2014年高等学校科技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时作出上述表示。

就科研评价来说,分类评价、开放评价将是改革方向。即对高校中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不同类型科技活动同等重视;同时建立与协同创新相适应的开放评价机制,打破小部门、小单位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评价创新活动价值,引入更大范围的利益相关方来评价创新活动的价值。

“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创新潜力,催生重大成果产出、更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是当前面临的重大科技形势。”杜占元说,今年高校科技工作重点是以科研评价改革为契机,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研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推进成果转化机制的突破;深入研项目研究和经费管理改革政策;推进“2011计划”升档提速,尽快形成支撑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机制。

在本次会议上,回顾了过去十年我国高校科技工作的整体进展情况:“稳中有进,量增质升”。



据统计, 2002 至 2012 十年间, 高校研究人力和经费投入不断提高, 科技专利增长了 17 倍达 6.8 万余项; 近 5 年来高校发表 SCI 论文数占全国比例保持在 80% 以上; 高校在国家科技奖励三大奖项比例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态势: 自然科学奖平均 60% 左右, 科技发明奖平均 70% 左右, 科技进步奖平均 45%。

同时, 会上还提出从教育发展方式、培养类型结构、培养模式、人才评价方式四个方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即从过去注重规模转变为注重质量提升; 从以学术学位为主转变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协调发展; 从注重知识学习转变为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并重; 从注重在学培养质量转变为在学培养质量与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质量并重。

(来源: 新华网 2014 年 04 月 11 日)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近日,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分别在学校网站发布了 2013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对各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进行了链接发布。这是教育部首次组织编制和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这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2013 届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相关分析、发展趋势等。部分高校还结合实际和学校特色发布了分层次、分学科、分院系、分专业、分地域的就业状况, 以及就业状况对学校招生、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影响评价, 并从就业状况、劳动报酬、就业满意度等维度构建了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编制和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是高校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 对进一步完善就业状况反馈机制, 引导高校调整专业结构、创新培养模式、接受社会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 《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3 日)

《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发布 商科就业难

3 月 29 日,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举办“2014 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暨高端人才洽谈会”, 《2013 年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同时发布。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询问商科、金融类岗位的学生最多, 而相关招聘岗位相对较少, 且提供此类岗位的用人单位多数希望留学生有工作经验。

来自教育部的相关报告显示, 参加就业意向调查的留学生, 超过一半没有工作经验, 三分之一的人有 1 至 2 年工作经验。这可能也是留学生要求薪资不高的原因之一。统计显示, 本科和专科毕业的留学生多要求月薪 5 千元以下, 硕士和博士期望月薪在 5 千元至 1 万元, 趋于理性。

(来源: 《北京考试报》2014 年 4 月 3 日)

上海公布年度本科预警专业名单 7 个专业被亮黄牌

上海市教委日前公布 2014 年度本科预警专业名单, 7 个专业被亮黄牌, 其中社会工作、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 3 个专业连续 3 年被预警, 应用物理学、社会学 2 个专业为 3 年来首



次被预警。

今年被预警的 7 个专业包括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社会工作、社会学。这些专业在上海高校重复设置较多,连续多年招生第一志愿录取率偏低,调剂和征求志愿录取率偏高,且毕业生签约率偏低。上海从 2012 年起对部分本科专业实施预警,当年有 18 个专业被列入目录,2013 年有 15 个专业被预警。

上海市教委提出,对于列入预警的本科专业,相关高校要淘汰质量低下的专业点,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低下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计划,甚至暂停招生。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 年 4 月 3 日,第 1 版)

重庆成立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盟

重庆科技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等 6 所参加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战略研究试点的重庆市属高校,近日在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成立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盟。

联盟高校在成立大会上审议通过了《重庆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盟章程》,规定联盟是重庆市属高校、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企业、有关团体等多方面自愿组成的工作协作交流平台。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应用技术大学研究,推进联盟成员间的合作,提出应用技术大学建设、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等。

据了解,目前全国共有 36 所高校参加应用技术大学战略研究试点。其中重庆 6 所试点高校服务区域发展积极性高、改革创新主动性强,转型发展观念转变快,转型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来源:《光明日报》2014 年 4 月 14 日,第 6 版)

武汉地区高校及科研机构有了科技成果自主处置权

4 月 8 日,武汉市政府常务会原则通过《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高校、科研机构职务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的意见》。《意见》共 10 条,核心是解开套在职务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所有权身上的“枷锁”,可谓目前全国关于职务科技成果管理“最突破”的 10 条建议。

据了解,《意见》赋予武汉地区高校及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自主处置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外,单位可自主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转移转化活动,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不再审批,科技成果转化所获得的收益全部留归单位,不再上缴财政;科技成果转化所得净收益,按照不低于 70% 的比例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团队所有;允许高校及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共享科技成果所有权,若高校拟放弃所有权及相关知识产权,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发明人,发明人有意受让的,应协助其有偿或无偿获得产权。

(来源:《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10 日,第 12 版)

浙江将在高校推广“一站式”学生事务中心模式

浙江省教育厅近日发出通知,在全省高校推广“一站式”学生事务中心(或办事大厅)模式,积极搭建集教育、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学生工作平台,改进高校服务学生工作,努力为学生解难



题、办实事。

浙江省要求, 高校要对现行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事项进行彻底清理, 对于没有法定依据或与上级文件精神不相符的管理事项, 要予以取消或调整; 要尽可能把管理和服务事项纳入“一站式”事务中心, 努力让学生“少跑一趟路、少进一扇门、少找一个人”; 省属高校原则上应于 2014 年秋季新生入学前建成学生事务中心, 其他高校应在 2014 年年底建成学生事务中心, 并倡导实体学生事务中心与网上办事大厅同步建设。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 年 4 月 7 日, 第 1 版)

上海交大自主研发的中文慕课平台正式上线发布

上海交大自主研发的中文慕课平台“好大学在线”(www.cnmooc.org) 8 日正式上线发布, 面向全球提供大规模中文在线课程。

“好大学在线”支持以短视频、强交互为特点的 MOOCs 基本教学模式, 是“中国高水平大学 MOOCs 联盟(筹)”的学习平台, 首期已有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新竹大学等学校的 10 门课程上线, 未来还将陆续有新的课程不断推出, 学生将通过该平台选修来自两岸三地知名高校的优质课程, 足不出户享受高水平教育资源, 并有望通过这种学习方式, 获取辅修专业学位。

在“好大学在线”发布仪式上, 上海西南片 19 所高校签下了慕课共建共享合作协议, 各校将慕课课程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 实现西南片高校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及学分互认。

(来源:《光明日报》2014 年 4 月 9 日)

同济大学首个海外校区在佛罗伦萨启用

近日, 同济大学首个海外校区——佛罗伦萨校区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正式揭幕启用。这是中国大学落户意大利的首个海外校区。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由同济大学、意大利环境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政府与佛罗伦萨市政府四方合作共建, 筹备工作自 2012 年启动。

作为同济大学在意大利的海外教育实践基地, 佛罗伦萨海外校区积极致力于全面促进同济大学与意大利设计创意类企业及知名教育文化机构的密切合作, 现已开设“海外暑期学院”、“学生春季学期”、“师资海外访学”等一系列教育培训项目, 并积极组织各类设计艺术交流、研讨和展示活动。先期以暑期课程、短学期、短期培训为主, 逐渐开设海外学期、海外学年等学制。

为惠及全国更多青年学子, 2013 年 4 月, 同济大学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将合作推出“高校艺术学科师生海外学习计划”, 力争将佛罗伦萨校区建设成为我国艺术学科大学生海外学习的重要中心和示范基地。双方已于去年暑期成功举办首个面向中意两国艺术学科大学生的“艺术、设计与人文海外暑期学院”。

今年 3 月, 同济大学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再次携手, 共同推出“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 2014 年春季学期”, 来自国内十所高校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的 29 名学生目前正在佛罗伦萨校区进行一个学期的专业课程学习。教学工作由同济大学联手佛罗伦萨大学、柏丽慕达时尚学院等当

地知名艺术院校合作开展,专业方向包括建筑、室内、平面、产品和时尚等。

(来源:上海教育门户网站,2014 年 4 月 4 日)

杭州师范大学将“慕课”引入正规教育教学

日前,杭州师范大学推出上海交通大学开放的在线课程(MOOC)——“慕课”,并将其引入正规教学,实现学分互认。学生可通过“慕课”学习跨校选课,积累学分,从而获得学位。据杭师大教务处老师介绍,“慕课”有一套完整的教学模式,包括选课听课、互动讨论、课后作业、评价考核等。教师线上讲解,学生在线参与。同时,“慕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学生也可根据具体课程安排,参加见面课程答疑,助教答疑或小组讨论等。此次,杭师大先从通识课程突破,试水“慕课”引入正规教育教学,“通过考核后,学生的慕课成绩将转换为通识核心课程成绩,并获得对应模块通识课程学分”。“慕课”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加开放、共享的学习空间和学习资源,有利于打破学校围墙,共享院校间的优势资源,学生的学习过程也将变得更加机动灵活。

(来源:浙江省教育厅网站,2014 年 4 月 10 日)

浙江中医药大学入选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近日,科技部公布“2013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国科发政〔2014〕71 号),浙江中医药大学成功入选“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是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园区为依托,由科技部、人社部、财政部等 8 部门共同实施,旨在打造人才培养政策、体制机制“先行先试”的人才特区。入选此次“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的共有北京大学等 38 个单位,其中高校 17 个、科研院所 10 个,科技园区 11 个。

(来源:浙江省教育厅网站,2014-04-02)

浙江首所中美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获准设立

浙江省人民政府 1 日收到了教育部发来的“同意设立温州肯恩大学”的公函。该大学是浙江省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

作为国内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试点项目,温州肯恩大学今年面向全国计划招收视觉传达设计、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 6 个专业共 500 名学生,学费每年 4.5 万元。学校 90% 以上的课程从美国肯恩大学引进,90% 以上的教师由美国肯恩大学选派和全球招聘,实行全英文小班化教学。学生毕业后被授予美国肯恩大学学士学位和温州肯恩大学学士学位,并颁发温州肯恩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毕业后学生可直接赴美攻读美国肯恩大学硕士学位,成绩优良学生可于第四学年修读美国肯恩大学硕士课程。

(来源:《光明日报》2014 年 4 月 2 日,第 3 版)



决策参考

有思想才能引领未来

——被忽视的大学责任（上）

哈佛校长佛斯特说过一段话：“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读后颇有感触。

关于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是不是被我们的大学忽视了？

世界近现代的历史都说明，国家的发展和崛起都和大学有关。德国的大学并非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但19世纪时，德国的大学理念在世界上可算是最先进的。洪堡当时强调学术自由，强调科学研究与教学结合，引领了当时世界大学教育的风尚，科学技术的中心也由英国转移到德国。那时候，美国大学也学习德国的先进教育理念。可以说，先进的大学教育理念促进甚至引领了德国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之后，1877年成立了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大学，重视“实学”，对后来的工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这不仅仅只是表明时间的先后，更重要的，恐怕是哈佛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传统如何影响和铸就了美国人的自由与创新精神。19世纪美国赠地学院（联邦政府基于“莫雷尔法案”将其拥有的土地赠与各州兴办、资助教育机构——编者注）的兴起以及后来社会服务的理念，也对美国的发展和崛起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大学对未来的作用。

大学对未来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引领。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但不能仅仅成为社会的风向标，而应该成为社会的发动机。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应能引领科技发展、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进步。

中国大学目前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尚不明显。尽管众多大学已经开始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但基本上还是以跟踪国外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为主。近些年国家在科研的投入上大幅度增加，高校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能力和实力都得到很大提高。但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和大学自身的观念意识不到位，研发方面过于注重短期实效，以至于对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依然微乎其微。好在我国政府和很多一流大学都已经意识到今后要能引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

而在事关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和文化方面，中国大学的引领作用绝不可忽略不计。譬如说，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国家治理结构、形态等会产生什么变化？未来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的走向，如何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文化中能够吸取什么营养，能否展现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这些都需要思想碰撞，而大学恰恰就是思想碰撞的最好场所。正是在思想的碰撞中，大学将起到引领未来的作用，也即真正肩负对未来的责任。

谁都明白,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人,那么人的现代化的重任,自然就落在大学肩上。目前,我国大学甚至还缺少这方面的意识。我们没有意识到为了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代年轻人需要何种思想前瞻?需要怎样的思想储备?没有这方面的充分准备,恐怕就会延误改革的进程,或者增加改革的难度。

影响社会进步的思想,多半产生于“思想市场”中。一个繁荣的“思想市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而大学应该是“思想市场”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大学欲引领社会进步、引领未来,重要的在于能出思想。能出思想的根本又在于独立精神与学术自由。丘成桐先生曾说:“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而不应该在政府、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大学,在此方面显得有些游移不定,常常左顾右盼,唯恐逾越雷池。的确,学术自由不能保证不出错误思想,但正确的思想,往往是在错误思想的伴随下形成并真正深入人心的。其实,当今中国大学中并非缺少有思想之人,他们的思想也有所表达,但是相当一部分都没能在更大的平台上表达,有些仅限于影响很小的几个网站上,或散见于博客、微博、微信,甚至茶余饭后的闲谈中。

引领表现在开放性、批判性。开放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思潮乃至异质思维的包容。某些异质思维,很可能在未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在出现之初,不就是一种异质思维?即使某些异质思维是错误的,在与正确思想的碰撞中,人们也很容易识别其谬误,而不至于有太大的社会危害。这一点自信恰恰是我们应该具备的。

引领也表现在批判性,社会中先进的思想往往都是在质疑与批判中逐步形成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也是能够体现一个社会先进程度的地方。如果在大学中都不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恐怕就很难体现其先进性,更遑论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以及对未来的责任了。

大学不仅要给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她向学生提供面向未来的思想、知识和意识,使学生养成面向未来的习惯。在思想活跃的大学中,学生耳濡目染,自然养成独立思考和面向未来的习惯,这对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也关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梦”的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大学,更需要发挥她对未来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的引领作用,这是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李培根,华中科技大学)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3年10月15日,第02版)



让学生具有真正的历史记忆

——被忽视的大学责任(下)

大学对过去的责任,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具有历史的记忆。习近平同志最近说过,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我们肯定不是对自己的历史完全没有记忆,只是对我们自己历史上的错误、丑陋、耻辱等,时常缺少深刻记忆。让学生记住历史,不管是荣光还是错误,大学有其特殊的作用和责任。

审视大学对历史的记忆如何,不妨先看看大学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中国大学对自身历史的记忆,更多着眼于过去的成就或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那当然值得记忆。但还有一些,却被淡忘了。中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不在少数,这些大学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时,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都存在其著名教授和学校领导被羞辱、被迫害的例子。虽然说,那种行为有当时的社会原因,但种种野蛮出现在大学中,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又如,有一些大学对学校出现的学术诚信问题或其他不端行为尽力捂住,生怕影响学校声誉。诸如此类的事,有几所大学“记得”?其实,留下记忆的重要性,远不在于记住事件本身,更在于那种记忆其实就是一种人格教育。

世界上有些国家及其大学对历史的记忆值得我们借鉴。可以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对待历史上耻辱和错误的记忆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在1837年发生了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七名教授因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之举而被驱逐出校,哥廷根大学让她后来的千千万万个学子记住了这一耻辱。2000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赔偿基金法案”,成立了“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对二战纳粹党劳工的赔偿。时任总理的施罗德,还把纳粹强制劳工称作德国历史中“痛苦的一章”。这些行为都得到世界的赞赏。相形之下,日本某些政客缺乏历史耻辱的记忆,是多么令人生厌。

对历史的记忆,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其实,不管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知道历史真相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几个重要时期(如三年饥荒时期、“文革”时期)的历史真相,别说年轻人,就像笔者这样年纪的亲身经历者,都所知有限,因为当初自己亲身经历的,毕竟只是局部的一点情况。至于现在的年轻学生,所知则更有限了。仅以“文革”为例,即使我们党彻底否定“文革”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却有不少年轻人对“文革”缺乏充分的认识。我问过不少大学生,对“文革”是什么感觉、有什么看法,多数同学的确都说“文革”不好。当我再问究竟如何不好时,回答各异,却少有深入见解。还有的只是听说不好,但说不出具体什么不好;极个别人甚至觉得“文革”也挺好,不是大民主吗?对于给咱们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很多年轻人没有感觉,甚至极少数年轻人竟对之有某种依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对此,大学该有何种反思?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看看我们的教材,对“文革”十年的劫难,只是寥寥数语,虽然否定,但由于太抽象,既缺乏对众多人和事的具体真

相的描述,又缺乏本质的分析,如何能让学生对“文革”有清晰的认识?

要让学生对“文革”真正有记忆,不仅让他们多知道一些的事实,还需要让他们知道“文革”错误的本质,理解产生“文革”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文革”中那么多人受迫害的情况,他们就能知道对人的蔑视多么可怕;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大串联、大字报等情况,他们就容易理解那种民粹式民主的荒唐;如果学生多了解一点人们那么容易被煽动,他们就知道个人迷信多么可怕;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那时残酷而诡异的斗争,他们就可能知道道德在无约束的权力面前多么不堪一击!对“文革”真正的记忆,就在于在对真相进行了解的基础上,进而思索人的意义、民主的意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

认识“文革”不是为了清算个人,而是为了彻底消除产生“文革”的社会机制和改良产生“文革”的社会土壤。如果学生真正了解了文革,知道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彻底否定了那一段历史,学生认识的肯定是一个勇于改正错误的党,一个实事求是的党,一个充满自信的党,一个值得信任的、能够领导中国崛起的党。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并对“文革”有真实感受的人,将逐渐离开大学讲台了,大学和社会又将如何让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具有真正的记忆?

对过去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为了未来。记住过去的痛楚和丑陋,无非是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无非是给予咱们国家对过去社会病的免疫力。

是否能对过去与未来负有责任,恐怕是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个责任是万万不能忽视的,也是万万不能回避的。不尽到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不可能是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概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梦”。故中国大学能尽到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那是社会之幸、国家之幸,当然也是大学自身之幸!(作者:李培根,华中科技大学)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3年10月17日,第02版)



高教视点

用科学理念主导大学章程制定

——在初步审定部分大学章程草稿中的发现与思考

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流淌着追求真理、学术理性的血液。笔者在初步审核大学章程草稿的工作中发现,应当改变将大学章程仅作为教育部31号令《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文件细化的做法,大学章程只有找准逻辑起点:为知识理性保驾护航,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章程。

彰显大学特色 引领知识理性之未来

大学特色的彰显不仅是对学校过去的特色进行总结和提炼,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期望。从目前对部分高校的大学章程初步审核来看,虽然文本词汇都较好,也蕴含着学校自己的内涵和精神,但对学校特色的凝练仍显不足,共性的东西太多,个性的东西太少。对于特色的凝练,不仅可以从学校发展历程、校训及校歌里面去找寻,也可以着眼于高校未来的发展规划。特色的彰显不是要做到面面俱到,而是彰显本校特色,让人觉得符合学校实际情况,恰似为本校量身定做,而不是千校一面,各个学校拿来皆可用。

大学特色的彰显应该进行认真梳理,在章程里面应该有明确的表述,以体现大学的精神。这是一项很精细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程序进行整理、讨论和认定。研究型大学和职业应用大学的特色显然是不一样的,在特色的确定过程中,应该对学校自身进行准确的定位。

明确大学的特色只是章程制定的过程,如何与特色相匹配的措施才是真正的关键。措施的最终落实是要培养学生,大学要避免世俗化的培养,对学生的培养要引领知识理性之未来,以先进、健康的思潮引领社会,而不是随波逐流。

进行协商治理 创设知识理性之环境

教育部31号令《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第5条指出:“高等学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在大学章程初步审核研讨中,存在着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譬如很多高校就面临着这样的困惑:学校是否有资格来界定与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即使泛泛界定,到底能否发挥真正的效用?笔者认为,在大学章程制定过程中高校需要与举办者充分地协商如何界定权力、责任,建立何种机制落实这种权责等一系列问题。协商治理并不是减少干预,而是以新的干预方式代替传统的干预方式。相对来说,协商治理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转变。

首先,进行协商治理意味着治理方式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举办者对一所大学的拨款制度、校长选拔制度以及建立理事会制度等活动的考虑,要综合多种因素。其目的是寻求一致性,在多元的一致性中确定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不是各个方案的汇总。总而言之,举办者在与高校之间对话协商中能够对高校作出远景的、总体的顶层设计,而不是展现一种分割的现象。

其次,进行协商治理意味着加大校长权力。校长与举办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会发生新的变化,不是以往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那么,校长的职责就不仅仅代表着高校本



身,而且要兼顾、协调、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通过协商治理,政府的财权、人事权就能够结合大学的意愿,掌握在大学行政领导手中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决策权就能够体现教授的选择,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之间的关系也就自然得以明晰。

最后,协商自治意味着更高的透明度以及更大的信心。为了实现协商治理,大学需要向举办者和社会表明其自身情况。协商不仅仅是写进章程里面的治理方式,而且是要融入到大学现实操作治理之中。由于协商治理综合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增加人们对协商治理政策的信心。

总之,高校内外协商治理不仅仅是公共决策,而且是治理方式的渐进改变,通过协商治理,赋予高校和教授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使其焕发活力,为知识理性创设适宜的环境。

健全参与和申诉机制 创建知识理性之保障

建立参与机制,就是从师生切身利益出发,为师生的各种诉求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建立参与机制,就是让促进学校健康发展的意见能够得到积极的回应和落实。师生生活在大学,感受真切,对大学的事情最有发言权。在制定章程过程中应像复旦大学那样广泛开辟表达平台,通过校报、校内新闻网和公告栏等途径,鼓励师生建言献策,并借助微博、BBS(电子公告板)等新兴工具展开深入互动,进而将交流的成果加以收集、汇总、梳理,融入章程文本之中,由此,让大学章程体现师生的意志。通过机制的建立,使校园充满温情和阳光,使师生得到尊重、宽容和关怀。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提升大学章程的质量,还将释放他们作为大学主人翁的自豪感,使大学知识理性得以焕发生命力。

初步审核高校章程,发现大部分高校往往忽视师生申诉机制的建立。建立申诉机制,就是当师生对行政行为不满或者反对的诉求能够得到处理,及时纠正违法或者行政失当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在章程中不仅要切合本校实际情况,明确师生如何行使申诉权、向谁申诉、申诉的时效、申诉答复的期限,以及不服申诉结果又如何救济等问题,还要对师生申诉的程序及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

国外学者皮特和凯斯提出,美国高校师生按照从低到高依次包括系申诉委员会、学院申诉委员会和教师评议会三种程序来展开申诉,各个委员会分别处理不同阶层师生的申诉。美国高校师生申诉的方式一般来说包括集体协商制度、听证制度和仲裁制度三种。我国高校章程在明确申诉机制时,应借鉴美国经验,健全申诉机制,以确保行政不当行为发生时,师生的知识理性等权益能够得到公正申诉。(作者:王海莹,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31日,第10版)

没了指挥棒 高校怎么办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不再用统一指标评审各校相关学科

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我国高校重点学科审批一直以来都是许多高校在办学过程中的指挥棒。尽可能多地拥有重点学科，获得政策与资金的支持，是许多高校努力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学科审批饱受争议，过度受到行政干预，高校发展急功近利等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发布，终于为多年来的讨论画上句号。取消审批之后，已经评上的重点学科怎么办？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审批方式？没有了重点学科“指挥棒”，高校究竟该如何理性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思。——编者

走偏：为评上重点学科，弄虚作假，公关评审专家、行政部门

“从 1986 年开始的重点学科评选和审批一直在引导和指挥着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因为这不涉及国家对大学学科的投入，而且也成为政府和社会评价一所大学好坏的重要指标，所以每一所高校都把拥有多少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最重要的办学指标。一个大学重点学科拥有率的高低，对于学校来说就意味着政府对学校投入的多少和学校在政府和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介绍。

他认为：“应该历史地看待高校的重点学科评估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从学科方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条件建设等方面对高校进行重点学科评估，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高校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科研水平的上升。”

但三轮国家重点学科评估后，也暴露出来了诸多问题。姜耀东举例说：“比如用统一的指标评审各校的相关学科，导致学校失去个性而追求高大全，同时，这种重点学科的评选和审批，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点学科向少数名校聚集，绝大部分普通高校很难有机会获得。”

在重点学科审批“走偏”过程中，高校自身也脱不了干系。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指出，“大学为评上重点学科，不按学科建设规律办事，而是急功近利，比较典型的就是花巨资引进所谓的领军人才，或者从其他高校挖来某个团队；另外，在评审中，不但公关评审专家、行政部门，还对学科建设进行包装，弄虚作假，在评审中并不鲜见。人才假引进、院士四处兼职，人才计划、成果申报中的跑、要现象都与此有关。”

用统一指标来衡量高校的发展容易带来“同质化”问题，这是重点学科审批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申报、审批的过程中，高校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利益交换的行为却也实实在在地加剧了重点学科审批“异化”的进程。

放权：高校将可发挥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自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之后，一些高校仍然处于观望之中，也有一些学校不为所动，按照已经明确的发展思路有条不紊地运转。

有高校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点学科目前只是 5 年一评，其审批的取消对于一些重点高校来说影响不大。这位负责人强调，对于有着较为清晰发展规划的大学来说，无论国家层面是否给予重点学科认定，都会明确自身的特色，将优势学科做大做强，在学校层面给予优质学科以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因为未来高校之间的竞争，除了综合实力的较量，还会有特色与个性的比拼。

因此,在向世界一流高校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首先要做的,是明确自身发展的特色、方向,练好内功。

“通过这次多项审批权的下放和取消,中央已经明确释放了信号,未来,政府会把不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全部交给大学,从而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这次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的取消,只是教育去行政化的开始,接下来在条件成熟时,招生计划审批权、考试组织权、学位授予权等也将逐步归还大学,从而真正实现管办评分离,大学真正做到自主办学。可试问,有朝一日当自主权真正掌握在高校手中时,有多少高校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专家指出。

为此,姜耀东分析,政府向高校放权,高校将可以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规律来发展学科,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但应当看到,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需要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学校治理水平同步推进。除了行政化,我国高校的管理水平普遍不高也是一个明显短板,还存在着诸如大学章程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大学学术权力虚位和二级学院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等问题。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对高校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建议:变审批为审核,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

取消重点学科审批之所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还折射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学科建设是大学的灵魂,取消审批后,高校的发展依然需要一个有关学科评价的科学、公正的“游戏规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认为,“建议变审批为审核,以此重构高校和政府关系,因为审批意味着高校按照政府制定的学科标准进行学科建设;而审核是高校自主地制定学科标准,政府按照高校的标准检查落实情况;审批意味着政府通过奖罚权来指挥高校如何办学,审核意味着政府通过信息权来监督高校如何自主办学。取消重点学科审批并不一定意味着取消给学术划分等级的做法,而审核是把取消学术等级放在系统的层面进行改革设计,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可行性。”

有关是否交由第三方来取代政府做出评价,专家们的观点还不尽相同,李奇就指出,“目前,交给第三方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客观可信,因为第三方组织需要时间发展成长,也需要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的保障。”但也有专家认为,适当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是大势所趋。

姜耀东就认为,“国外大学的学科建设质量的保证主要是靠学校内部保证机制和独立于政府的外部监控体制。”他建议,通过建立国际认可的学术标准和质量评估机制,明确教授、学生、大学、政府和社会等方面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责任,充分发挥教授和大学自身在质量保障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由国际同行、校外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讨论式地对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向全社会公布。(记者 赵婀娜)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04月02日)

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及运行机制的探析

21 世纪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这一时代背景要求高校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加强同外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重大综合性科研项目的有效运行, 需要多学科和多部门主体间的协同创新。跨学科研究是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主导范式, 日益成为引导高校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增进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的重要举措, 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 明晰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内涵、特征、功能及其影响因素, 构建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非常重要。

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内涵

1. 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定义。跨学科研究组织是以“问题为导向”, 横跨多门学科, 承担综合性、复杂性的重大项目而建立起来的进行科学研究的组织。协同创新是各个创新要素的整合以及创新资源在系统内的无障碍流动, 它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 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教育部门为创新主体的价值创造过程。当今时代, 跨学科研究组织在解决重大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阵地。协同创新打破了不同学科和部门之间的壁垒, 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是指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以横跨多门学科围绕问题而建立的科研组织为依托, 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 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 推动重大问题的解决、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2. 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特征。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具有六大特征: 一是问题导向性。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是以“问题为导向”建立起来的, 着重进行重大问题的解决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攻关, 体现出问题导向的本质特征。二是整体性。创新主体之间、各要素之间的联合并不是简单的相加, 而是在协同目标、方式、功能上的有机结合, 体现出主体的统一性和要素的综合性。三是动态开放性。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以问题为导向聚集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组织部门的优秀专业人员, 面向高校、企业与政府, 依据任务的特性有长期合作也有短期配合。它往往因问题的产生而将人员聚集起来, 也通常因问题的解决而离散, 人员之间流动性较大, 体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四是前沿创新性。不同学科文化背景、组织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员在合作交流中拓宽视野, 激发创新思维, 有利于前沿理论与技术的创新。五是跨越性。这种跨越性不仅包括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跨越, 还包括高校、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跨越。六是复杂性。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包括高校、政府和企业等多重主体, 在知识、资源和行为等方面进行整合, 在协同过程中还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利益分配等, 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运行过程。

3. 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功能。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主要有两大功能: 一是促进科学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功能。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打破学科和部门之间的壁垒, 促进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服务于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跨学科研究成果质量的功能。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是协同企业、高校与政府各项资源共同致力于重大问题的解决与科学技术的创新, 必然能促进高校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此外, 跨学科研究成果在各方协同中更能成绩卓越。

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

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各个主体和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整合。



在运行中,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与互动过程影响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发展。

1. 个体因素。跨学科协同创新领导者、成员的个人素质与能力直接影响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发展。优秀的跨学科协同创新领导者要求具备如下素质:一是跨学科知识背景与协调学科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的能力。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成员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组织部门,不同的学科文化背景、组织文化背景必然带来合作中的摩擦,这就需要领导者具备协调学科文化差异与组织文化差异的能力,妥善处理分歧,尊重各学科文化、组织文化的独特性,带领团队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二是组织领导能力。在协同创新中,领导者合理的组织领导会直接推进跨学科研究的顺利进行,尤其在重大问题方面,坚强的领导核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是领导者的个人魅力。领导者不仅需要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还需要令成员信任的个人魅力,这种个人魅力体现了领导者的综合素质与个人品质,吸引成员积极参与团队活动,形成团队合作的向心力。成员的素质同样重要,跨学科研究组织要求成员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熟练的操作技能、端正的科研态度、积极的跨学科思维、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与团队意识。学科知识与技能是从事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的基础,端正的科研态度与跨学科思维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的推动力量,而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团队意识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的保障。

2. 组织因素。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组织目标、结构、规模、文化和任务影响协同创新的顺利进行。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组织要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清晰的结构、合理的规模、健全的文化明确的任务。跨学科研究组织因问题而生,组织目标围绕问题解决与知识技术创新而展开,明确的目标指明了其前进的方向。我国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组织结构运行基本有三种形式:矩阵组织运行方式、系统或混合组织运行方式和松散联合组织运行方式。第一种是我国高校普遍采取的形式,适用于同一所高校组织多个系、学院参加重大项目的跨学科研究;第二种是根据某一课题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跨学科组织体系,根据实际需要,分配组织要素,这种形式适用于主题式重大科研项目;第三种一般以校内现有的研究为基础,由自愿参加的研究机构为主体,进行跨学科研究,比较灵活。因此,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适当的组织形式对于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极其重要。此外,在组织运行中,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强调团队合作意识的同时注重鼓励成员的自身发展,调动组织成员协同攻关的积极性。

3. 互动过程。在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知识共享与转移影响其有效运行。这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到多个主体的参与、多种资源整合和多种利益的分配,因此,需要成员之间在领导者的组织领导下进行有效的沟通,实现知识资源的共享与分配,合理协调内部分歧与差异,平衡各方利益,使得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沿着健康、有序的道路前进。

构建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推动高校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对于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与综合实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高校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运行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加快高校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打破学科和部门之间的壁垒,深化主体协同、组织协同与环境协同,确保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取得预期效果。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

1. 构建长效的决策机制与人才选拔体制。在由企业、高校和政府组成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

创新的系统中,应该采取措施使得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更好地发挥整体效益。首先,选拔优秀的“学术创新型人才”作为组织的领导者,要求其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与协调学科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的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以及个人魅力;其次,建立以领导者为核心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组织内外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利益分配,确保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顺利发展;最后,按照自愿、公正的原则选拔不同学科和部门的优秀专业人员作为组织成员,要求其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熟练的专业技能、端正的科研态度、积极的跨学科思维、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在“学术创新型人才”的领导下,针对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特点和定位以及跨学科研究合作项目的要求,形成有效的决策机制。有效的决策机制与人才选拔体制构成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人才保障。

2. 建立健全的组织文化机制与激励机制。跨学科研究组织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和部门,不免带有各自领域内的文化特征,这是各个成员的优势也同样会给协同合作带来障碍。因此,需要健全的组织文化来协调这种差异,构建企业—高校—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促使三方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融合互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此外,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上优化学科组织建设,创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环境保障,激发创新活力,建立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根据研究项目的内容与性质以及成员的学科归属与部门归属,合理分配任务,并建立风险承担与责任机制,按照各主体承担风险的大小与任务完成程度来分配收益,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个体,充分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3. 构建完善的资源协同机制与信息沟通机制。首先,要加强人才资源的协同,人才是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核心资源,高校作为人才的集聚地,理应以其人才优势吸引企业和政府人才的加入,协同各方人才,全力攻关。其次,要加大资金投入的协同。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发挥科研资金的指导作用吸引企业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企业和高校通过社会服务吸引政府资金与企业资金的投入。再次,加强信息平台建设,促进跨学科、跨部门人员良性互动关系网络的形成,构建良好的信任环境,确保信息渠道的通畅与科研成果的顺利转化,确保成员之间民主协商的通畅与合作的可持续性发展。最后,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现今的资源共享平台往往以高校为依托,共享性较差,因此,要推动资源平台向企业开放,实现知识共享、成果共享,调动企业积极性,减少冲突,增强合作。

协同创新要求大学和企业创新能力中形成动态的互补结构,既能充分利用各自的分工优势与潜能,又能在推动产业创新中耦合起来,形成乘数效应,驱动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9]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要求企业、高校和政府协同过程中形成动态的互补结构,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整合资源、挖掘潜能,协调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利益分配,协同各个主体通力合作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使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沿着健康有序的道路发展。(作者:杨连生、钱甜甜、吴卓平,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及其支撑条件研究”(项目编号:71240010)阶段性成果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2014年第04期)



社会服务, 地方高校边界在哪里?

编者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美国的大学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 倡导“踩在牛粪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 提出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现在, 社会服务通常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并列为现代大学的主要职能。但是有人认为我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相对其他职能来说, 在认识上存在缺失和庸俗化、工具化倾向。也有人认为大学教授注重“横向”课题, 忙着赚钱, 误人子弟。本版约请北京物资学院院长王旭东就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以及我国大学, 特别是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发展状况与困境进行深入探讨。

威斯康星思想——大学走出“象牙塔”的缘由

“大学应成为灯塔, 积极促进社会发展, 使全州的人民都能与这所大学的人才和知识发生联系, 使每一户人家从这种联系中得到益处。”——范·海斯

“威斯康星思想”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实践及办学理念。范·海斯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期间(1903—1918), “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第三项职能被明确和大力倡导。范·海斯提出的“服务应该是大学唯一的理想”、“学校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等观点被总结概括为影响深远的“威斯康星思想”。

近代大学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 最初的大学设有文、法、医、神四个学院, 只有医学与生活密切相关, 神学院却是四个学院的核心。人们将此时的大学称为“象牙塔”, 一方面因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圣殿,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大学远离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状况。

高等学校清晰的、普遍的社会服务观念始于美国“赠地学院”创办时代。19世纪中叶, 工业化的发展要求高等学校培养工业和农业技术型人才。1862年, 美国出台《莫里尔法案》, 该法案规定, 各州凡有议员一名, 联邦政府便拨给土地3万英亩, 可将其收入作为建立农业和机械工程学院的基金, 用以为地方发展工农业培养人才。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赠地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即是美国最早的“赠地学院”之一, 该校为社区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也提供许多有关卫生、经济、管理与教育等方面的咨询, 成为其所在州的智囊。这标志着高等学校第三职能——社会服务职能的正式产生, 也是美国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威斯康星大学因此成为继中世纪大学、柏林大学之后, 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威斯康星思想”成功的首要社会背景。20世纪50年代, 美国高校社会服务职能获得了长足发展。高校通过服务帮助美国创造了农业奇迹, 促进了工业化迅速实现。随着大学走向社会生活的中心, 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大学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轴心”、“杠杆”、“成为周围社会的源泉”。

前景与困境——我国地方高等学校社会服务发展的现状

我国高等学校可分为部委院校和地方院校。地方高校是指由省级或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拨付经费, 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的高等院校。两千多所高校中, 部委院校仅一百多所, 其余都属地方院校。根据社会发展现状、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地方大学的办学特点, 积极拓展社会服务职能是地方大学准确定位、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明智选择。

更好地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是地方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其自身发展的动力来源,也是其获得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各方面支持的保证。大众化教育与精英化教育的一个根本区别即高等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实施大众化教育和普及化教育,主要任务是由为数众多的地方大学来承担的,地方大学必须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增强社会服务意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阶段,在人才培养职能方面,高校很难有规模上大的拓展,这也为地方大学面向本区域加强各类技术培训、文化培训提供的条件、提出了要求。多数地方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受人才、条件限制,难以承担基础性、前沿性重大课题研究,要拓展其科学研究的职能,惟有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为区域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取得更具现实意义的科研成果。可见,地方大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把积极拓展社会服务职能作为发展的重要选择。

但就现状而言,许多地方大学还远未认识到拓展社会服务职能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仍按照原有的办学模式,在人才培养上追求规模、层次,在学科专业设置上追求大而全,在科学研究上不面向实际、不联系实际,只关注课题数量、论文数量,学校与区域社会互动很少。当前一些地方高等学校开展的社会服务,包括教育拓展服务、科研服务、产学研联合体、高校资源服务等,也多呈现服务半径小、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低等特点。

究其原因,地方高校对发展社会服务的认识还不足,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体制机制。我国大部分大学设置的职能机构中没有针对、协调社会服务的部门,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服务工作多数是院系或者教授直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联系,沟通渠道往往还得通过人际关系。教育部门制定的评价考核标准仍然是以文章为重,对于社会服务没有具体的指标。

有的地方高校对开展社会服务存在不正确的或肤浅的认识,不怎么赞成开展社会服务;有的地方高校虽然认识到地方高校需要开展社会服务,但由于办学观念、指导思想、思想境界、开拓精神以及实际措施等方面还存在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高校社会服务的开展。部分高校强调为社会服务,往往过分注重“有偿”而遮盖了其本来面目,贬损了它的真实意义。导致高校内外相当一部分人以狭隘的、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高校的社会服务,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有偿”与“创收”上,这也是导致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对高校服务功能的误解。

尽管地方高校在本地方社会服务方面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和“亲缘”优势,但人们对其服务能力、水平层次方面的信赖感还不够。要把这种理论上的、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实践的、现实的优势,既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又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

“反哺”与“多赢”——社会服务和教学科研的关系

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有利于高等学校师生的全面发展。通过社会服务活动,教师可以了解本专业最新科技信息和动态,从而使教学内容更具时代感和实用性,最终增强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社会中去并锻炼实际工作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服务是当前中国地方高校寻求突围的有效途径。单以学生就业来说,地方普通大学毕业生是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弱势群体”,而同时社会又急需应用型人才却招不到。如果地方大学通过社会服务的平台,加强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不失为走向“多赢”的一种方式。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最根本的职能。强调重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是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的基础上拓展大学社会职能,提高大学对社会的贡献率,同时要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对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学的社会服务必须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基础,只有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了、科学研究水平提高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才能提高。另一方面,社会服务也能有效促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大学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可以“反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改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条件;同时,社会服务打开了学校大门,帮助学校更好地了解社会需求,使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具现实基础、更有针对性,因而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可见,大学三项社会职能是相互促进的。当然,具体到一所学校、具体到一位教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上有一个时间精力合理分配的问题,协调不好会顾此失彼。

不只把社会服务作为大学要履行的一项独立的社会职能,也把它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

高校并不是由一堵围墙包裹起来与世隔绝的深院,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产物,社会的需要是高校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理由。

地方大学如何有效服务社会?可以有多种模式来实现。诸如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成为区域内重要的人才培训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等。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向社会开放,从理念上摆脱“围墙”“边界”的束缚,与社会共享资源,成为区域资源中心。传统的大学是高墙深院,与墙外的世界泾渭分明,不相交融;而现代大学,特别是以服务区域为职责的地方院校应当向社会开放,与社会融为一体。大学的许多资源都可以适当向社会开放,如图书馆、实验室、测试中心、电教中心、计算中心、体育馆等。

在发展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大学领导者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怎样使大学以尊重各方利益的方式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并且防止不合理的干涉行为,维护学校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大学在与政府、企业合作开展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需协调好与各合作主体的关系。比如,大学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也可能会走入由于经费依赖而追求功利的误区,大学不能只是被动地按照政府机构、公司等确定的议程来为社会服务。同时要协调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者关系。大学在增加有用的课程计划和服务项目时,还必须防止服务冲击教学。(作者:王旭东,北京物资学院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09月18日,第14版)



工科教育再不“升级”就拖产业发展后腿了

——日本科教界频频来华揽才带来了什么启示

带着日本科教界一行十几人,日本文部科学省前大臣、中国国际友好奖获得者有马朗人又一次来到中国,时间和去年一样,3月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期间;目的也一样,来华揽才。用他自己的话说,“解决日本人才短缺问题,除了自身加强人才培养,还需尽快地吸引国外优秀人才”。

今年,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国际教育巡回展之外,有马朗人及其同仁还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以产学研合作推动国际创新”的中日大学论坛,并特意邀请中国科教界尤其是高校领域的负责人参会,希望藉此“向中国取经”。

论坛上,不少日方人士“吐槽”本国工科教育,“日本工学研究脱离社会”、“工科学生没有出口”、“理工人才日益重要”等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邀的中国大学校长们在论坛上高调宣传中国教育发展之迅速,创新工程成果之显著。

然而,中国工科教育远不像大学校长们说的那么乐观。正如中国经济形势一样,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之下,暗流涌动。有马朗人也曾提醒:在上大学毛入学率升高时,“拔尖人才难寻觅”将成为一个国家遭遇的难题,目前日本就面临这种情况,而在中国,类似的问题也露出了端倪。

几乎是同一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访问期间参观了吉利集团旗下的沃尔沃比利时根特工厂。当中国媒体聚焦于该工厂自2010年被中国吉利集团收购后所取得的诸如产量稳步增长、增加当地就业等成就时,一个重要的细节却经常被忽略,沃尔沃汽车之所以将中国看作其第二故乡,更多地是在于中国拥有能够让其实现全球复兴计划的“市场”。

又是市场。中国如果无法走出“以市场换技术”的老路,诸如汽车等制造行业的核心零部件技术方面将永远无法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正如一位德国专家在中国参观汽车厂后给出的那个意味深长的评价:“我只要看汽车的钢板翻边就能知道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孙禺就此表示,有很多国外企业到中国来建厂,但是生产的东西就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一个钢板翻边就能看出质量如何,这里面不仅有工艺问题还有人的素质问题。

这并非妄言。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面临严重的“人的素质问题”。当时,尽管日本高科技企业对工科类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但年轻人报考工科的热情却大幅下降并延续至今。根据日本总务省2009年的估算:决定数控机床自动化水平的数字技术行业,日本缺少近50万名工程师。

尽管所处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不同,但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也难以躲开这个“人的素质问题”。根据2013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研究报告估算,2020年的中国将面临2200万人的工程技术人才缺口。这其中很大部分属于懂得计算机、网络的高端人才,就软件产业来说,到2015年从业人员需翻一番,报告认为人才缺口届时可达300万。

高端人才培养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整个制造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步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奇怪的是,当工程师缺乏、合格的工科学生奇缺、优质工科生身价暴涨等新闻满天飞时,年轻

学生逃离工科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给出一则数据：2010 年工学门类本科招生人数 117 万，相当于 1998 年人数的 4.4 倍，但整个本科阶段的招生人数却同比增加近 6 倍。不同于法律热、金融热，中国市场上的“工程师热”似乎遭遇了“反市场”的尴尬：市场喊缺乏、身价也看涨，却仍鲜有学生来报考。

不可回避的一点是，传统观念中，不少人认为，“工程师”听上去是个苦活、累活，甚至屌丝活儿，此外，艺术家、科学家都是“家”，而工程师只是个“师”，这或许是阻碍学生报考工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个断层的问题，工程教育应从小抓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认为，国家需要营造一种“工程崇拜”，他呼吁，“给工程师正名，没有工程师的创造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文明！”在美国，工学教育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的 12 年教学过程。而在国内，学生只有进入大学后才有可能开始接受工学教育。

传统观念让工程师“蒙羞”只是一方面，关键问题还在工程教育本身。用胡瑞文的话说，“我们的工科教育现在严重不适应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那么，学生凭什么来？”

有人曾说，“现在不会跳舞的人在教别人跳舞，不会炒股的人教别人炒股，不会当工程师的人教别人怎么当工程师”。而在王孙禺看来，就如同很好的料子，被大学剪成了墩布，还怎能做成西服？

王孙禺说，现在的大学承担了过多“补中学课”的责任，本应中学解决的素质教育问题直到大学还占用大量的课时，“教育问题是总体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不是教育系统自己能够完成的，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工程。”

麦可思研究院院长王伯庆则将眼光放到了校园，“中国制造的决战在校园”。他认为，能否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制造业合格人才，校园里的作为是关键。这和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的看法不谋而合，他认为，一个现代的产业制度如果没有现代的教育体系配套，那中国制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创造。

不仅如此，产业界的参与度太低也成为工科人才培养体系的一大薄弱环节。论坛上，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列举了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科研活动的选题研究方向与产业的实际需求有脱节、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联系松散、现行大学的科研评价机制不利于大学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等。

纵然日本已是全球制造业的翘楚，但依旧为了重振雄风四处寻觅顶级产业人才。十年树人，事关人才培养需要早作打算，还在谋求发展的中国，更当未雨绸缪。正如一些专家所呼吁的，别再抱着陈旧的课程体系让年轻学生徘徊在“吃香”的行业门外，也请别再用“去绑钢筋，去施工”等已经“out”的词汇吓跑学生，吓跑我们未来的大飞机制造者、航母打造者……

今年，我国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除了说明中国经济迈入“服务化”时代，还彰显了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化，也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在这个新征途中，可千万别因为工科教育“升级”慢而拖了后腿。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 年 4 月 8 日，第 03 版）



教育评估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改了什么?

编者按:最近,国务院学位办推出了《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拟于本年度启动对全国学位授权点的合格评估工作。说到评估,人们并不陌生,那么,立足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将对研究生教育产生哪些影响,有些什么改变呢?本文作者所做的剖析,对高校如何准确把握合格评估的实质,做好合格评估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学位授权点不再是“终身制”

自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78年的1万多人发展到2013年的60多万人。不过,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生教育跨越式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方面:第一是质量问题。创新能力弱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据2007年北京大学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在与国外的横向比较中,45%的培养单位认为,我国博士论文在理论的原创性上与国外“有明显的差距”。第二是结构问题。具体表现在研究生教育尚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导致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较为关键的是: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很好地适应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学位授权点能上不能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因此,在法理层面上,学位授权点不是“终身制”,更不是铁打的营盘。随着学术自身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高校办学目标的调整和师资力量的变化,学位授权点也要进行动态调整,主动适应需求。从新发布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来看,是紧扣上述两点,开展周期性和常态化的认证和评估,从而打破学位授权点的终身制,以摆脱我国研究生教育面临的上述困境。

合格评估以自我评估为主

概括起来,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力求实现以下几个转变:引导培养单位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评估转向一种日常的主动、自发的内在评估,强化常态性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评估方法由以定量为主转向定性定量的结合;评估主体由过去的政府主导转向以培养单位自评为主,充分发挥第三方同行专家的作用。

从新发布的办法看,没有统一刚性标准,不设立繁琐的程序,充分考虑到培养单位的现实需要,允许各单位根据情况,统筹博士点与硕士点、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评估,允许其自主确定评估方案和评估口径、自主安排评估时间与进度,鼓励有条件的培养单位积极开展国际评估或认证,根据其自我界定的标准,结合学科发展的未来前景或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间的适应性,自主调整学位授权点,如此等等都是在打破过去评估工作中的“被动式”,鼓励高校结合自身学科与培养特色自我举证和自我诊断,从而引导其围绕自身定位明确培养目标、创新培养机制和形成特色,在最大程度上呵护培养单位的自主权和特色。

评价导向转向重人才培养

从新发布的办法看,合格评估避免以科研为主导的倾向,评估内容的呈现以写实为主,突出人才培养的质量、特色和效益,淡化量化规模指标,克服了以往重量轻质、见物不见人的不良导向,把人才培养质量,而不是将科研水平置于核心地位,如学术学位重视科研素质与创新能力、专业学位重视实践与职业能力。可以说,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力求使评价导向从过去的“重科研”转变为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总之,本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以尊重多样性、简化程序、注重实效为原则,不仅吸纳了国际上通行的评估理念、制度与经验,而且也充分照顾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体制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

合格评估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避免评估走过场。以培养单位自我评估为主,很容易产生走过场和形式化的现象,偏离评估目标。为避免评估走过场,要进一步细化评估办法,制订一个具有指导性的自我评估指南,指导培养单位制定明确而具体的自我评估方案。评估方案的严肃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可行性本身,就是自我评估质量的体现。

第二,无统一标准,不等于没有基本要求。以自评为主的合格评估虽然不设立统一标准,但标准和要求可能更高,各培养单位的合格标准要与其发展目标和办学水平相一致,这个标准不能低于国家基本要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第三,评估是手段,诊断问题才是目的。合格评估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的“证实”和“认可”,而是评判其人才培养规格、特色和标准是否明确,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采取什么举措来解决问题。因此,无论自评报告还是同行专家评议意见,其主体内容构成应该包括写实性、分析性、诊断性和规划性等多个部分,尤为突出问题诊断和改进措施。为避免自评报告流于浅表化和形式化,自评总结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查证性有必要作为考核自我评估工作的依据。同时,为便于同行与公众监督,自我评估总结报告要在指定信息平台上向社会公开。(作者: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来源:《光明日报》2014 年 03 月 25 日,第 13 版)



他山之石

武汉科技大学：培养有“张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又到一年毕业季。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727 万，比去年的 699 万又有所增加。为了躲避眼前的就业压力，部分地方本科高校沦为了“考研基地”。

本科生盲目考研，与一些普通高校教学应用性不够直接相关。同为普通本科大学的湖北省属高校武汉科技大学，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有着独到经验。企业每年向该校本科毕业生提供的岗位数和毕业生数的比例达到 6:1。该校也连续 10 年保持高就业率。应用型人才究竟应该如何培养？记者带着问题走访了武汉科技大学。

优化设计，专业、课程该调的调，该撤的撤

“反思一下，现在的大学课堂里有多少内容是过时的？有的工种已经不存在了，可大学的专业还在招人；有的工科生读了 4 年，连本专业的行业结构都不清楚。这样纸上谈兵培养出的本科生难怪企业不会要。”有教育专家这样抨击当前的大学教育。武科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陈涛说，“应用性不足，所学难以付诸应用，加之近几年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有的行业已是明日黄花，本科生就业更是雪上加霜。”

“相比于诸如职业教育、MBA 等明确面向就业市场的教育品类，本科教育还是有点定位不准，因为本科教育既有其通识性、基础性特点，又有其专业性、学术性。企业是用人的主体，如果现在的本科教学在出口建设上更多将企业需求纳入进来，会更切实际。”武科大校长助理吴怀宇说。

在探索本科教学过程中，武科大对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设计。在学校董事会成员、50 多家企业做调查，收集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数量和规格信息；借助网络平台统计分析全国相同专业的学生数和毕业生就业情况；收集国家和地方政府产业调整、转型升级、行业发展的政策信息。

结合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武科大每年都对专业设置、招生数量和培养方案做出改变，增强应用性。自 2007 年起，本科增加机械电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等 18 个需求旺盛的新专业，撤销、合并矿山机械、矿用汽车等 12 个老专业，各专业的招生规模根据市场需求每年调整。

有专家曾质疑这样的做法会扰乱“经典的课程体系”，是对传统的破坏。而吴怀宇认为，“现在的本科教育没必要端着精英的架子，地方高校就是要培养企业能用、好用的人才。专业设置要紧跟业内前沿。”

经过调整，武科大将工科类专业实践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从国家要求的 25% 提高到 30% 以上，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大学本科 4 年。“当然，培养方案的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专业变化是否成功要等 4 年后才能看到。但是我们适时动态的调整，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课程是较新的、用得上的。”

陈涛说。

实行双导师制，本科培养上“双保险”

“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就必须加大实习实践的力度。但是一些工程类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有很多顾虑。”吴怀宇说，比如对生产效率、安全事故和技术泄密等。

然而，武科大仅在湖北省内就拥有武钢、中冶南方等 170 多个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每年能接纳 2 万多名武科大学生实习实训。这受益于武科大多年来依托钢铁冶金行业和湖北省经济发展实施的“校企合作，共享共赢”的发展模式：武科大为企业提供科研、人才服务，企业为武科大提供科研经费、实习基地。

为了“适销对路”，武科大一半以上的学院开设了卓越工程师班、新兴产业人才培养班等特色人才培养班。对人才的要求进行“定制”培养，每个班有专门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另外，在特色班创立本科生培养“双导师制”，每 5 名学生配备 1 名校内教授和 1 名企业高工做导师。前 3 年，学生跟着校内导师蹲实验室，做课题，到大四跟着企业导师在企业生产实践 1 年。

“大四学生全年都泡在企业，一年分为 2—3 段，学校给学生开出任务单，跟着企业导师完成规定任务。”武科大教务处处长程光文说，为了将双导师制落到实处，培养的全过程有质量监控和考核验收程序。

追求高大全是地方院校发展的“常见病”，一部分地方高校专业重复设置，其后果是牺牲人才培养的质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企业招不到想要的人才。“这和现有的评价体系有关，老师评职称，搞教学的干不过搞科研的。大学的评估也是科研占比过重，部分地方高校为了提升排名，把精力从教学转移到科研。”陈涛说。

“归根到底，本科培养的最佳状态是培养有‘张力’的本科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使命是培养人才，各个学校的区别在于培养什么层次和什么规格的人才。武科大坚持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上能深造，下能就业’。”武科大党委书记刘华才说。（记者杨宁 程毓）

（来源：《人民日报》2014 年 04 月 10 日）

下放学术权力 让科研细胞活起来

——南开大学试验人事制度改革特区

33岁的南开大学副教授汤平平只用了不到18个月的时间，便组建起一支10人的科研团队。这让他到校前的顾虑一扫而空。

他初到这所大学任教时，跟别的新教师不同，立即获得了200万元人民币的启动经费，每年可破格招收两名博士生和3名硕士生，考查期前3年可以暂时不承担教学任务，以全力打好科研工作基础。

这一切得益于该校的“人才特区”政策。一年半前，汤平平从哈佛大学归国，加盟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别于以往“终身制”聘用方式，该校对他采取了与国际名校接轨的“3+3”考查、聘任制。

汤平平在回国前，不是没有顾虑。经费、设备方面学校能给多大的支持？学校的整体氛围如何？“海龟”与“土鳖”该如何处理关系？用人制度的灵活度如何？这些是很多想回国却又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的人最担心的几个问题。“如果回国后‘论资排辈’只拿到一个副教授，那很多方面的支持就会非常有限。”汤平平说，“最主要的是，人事制度僵化可能会严重限制你的发展。”

南开大学的“人才特区”发源于“人才困境”。汤平平的这些担心，恰恰在另一名归国青年学者的曲折经历中得到反映。5年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具有国际知名医药企业工作经验的梁广鑫决定回国。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其林十分希望梁广鑫加盟。但在作最终决定时，周其林犹豫了。

据梁广鑫回忆，招聘面试结束后，周其林面露难色对他说，由于用人机制上的约束，如果梁广鑫到了化学学院——这是我国最杰出的化学学院之一，只能从副教授做起，不能带博士生，科研资源和待遇也都相对少一些。

周其林担心的是“熬资历”式的发展路径，可能会不利于梁广鑫这类青年人快速成长。

“最后，周老师建议我去别的学院。因为，我在那里可以评到教授，就会有实验室，能招生，研究工作也就能先‘开张’。”梁广鑫说。

事实上，周其林的科研队伍当时缺乏年轻的挑大梁者，人才队伍呈枣核形，对于实验室乃至整个学科的长远发展意味着后继乏力。对于实验室本身来讲，虽然具有给年轻人提供更大支持的能力，但囿于政策，就是不能放手招人。这次忍痛割爱的经历，让周其林下定决心找学校，寻找解决人才人事问题的新的突破口。

元素有机重点实验室破解人才引进困境的强烈诉求，与南开大学的改革思路不谋而合。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表示，要着力构建更加科学、更具活力的用人机制。“改革要立足助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积极为优秀年轻人才成长创造有利环境。”

在具体举措方面，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主张建立人才改革试验区，积极探索以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人才特区和创新学术团队建设，以国家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在特定区域实行特殊人才政策和特殊机制，不断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新机制、新办法。

经过审慎研究，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这项改革的首块“试验田”。

“这其实是一所学校内部学术权力能否下放的问题。”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说，“只有各个学科、学院、重点科研单位的专家们才更清楚他们在国际、全国以及本学科中的地位，知道该怎

样发展学科,构建怎样的人才队伍。学校需要做的只是为其提供好的政策环境以及多方面的辅助支持。这是南开大学进行内部人事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事体制之所以不活跃,甚至影响到了学科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产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校内部的学科、学院、系、所不太活跃。”佟家栋说,“这些单位就像是一所学校的科研‘细胞’。要想让他们活跃起来,必须让他们有积极性,最重要的是能让他们自己去选聘人才。”

“人才特区”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打破“终身制”模式,采取“3+3”考查、聘任制等多种灵活模式聘用人才,能够破格给青年人才更多的资源支持,包括可以直接招博士生、拿到本单位和学校共同支持的薪酬待遇等。

与此同时,校方要求“人才特区”严把质量关。考查期满,学术委员会将对引进人才的科研成绩、学术影响和发展潜力进行考核,对不称职者将解除聘任合同,以此确保引进人才的质量。

“这样的模式,很好地解决了高校人才引进工作中一直以来难以突破的待遇低、路径长、不合格人才难以流动等问题。”佟家栋说。

佟家栋说,人才特区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原则,选择在重点学科、重点科研基地进行试点。同时要求这类单位,负责人要敢担当,要有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勇气。

2009年6月的一天,还在为如何在有限条件下开展工作而苦苦思考的梁广鑫,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周其林教授高兴地告诉他,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拿到了学校政策,可以给他200万元的启动经费、不小于200平方米的实验室,而且每年可以有两个博士、3个硕士的招生名额。

当年9月,梁广鑫正式进入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带领着5人科研团队迅速投入工作。次年6月,团队的第一个成果“agelastain A”——一种比著名抗癌药物顺铂活性强10倍左右的海洋天然产物被成功合成。

自2009年至今,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保持引进1到2名具有“国家青年千人”水平的学术骨干,迅速建立起了一支青年人才储备充足、老中青结构合理、具有强劲科研实力和创新后劲的人才队伍。

与此同时,“人才特区”的成功经验也在扩散,该校的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学学院、商学院以及“2011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借鉴国际通行的人才聘用和培养模式,试行了包括“3+3”考查、聘任制在内的人才遴选、聘用、薪酬、培养、激励和考核的一揽子“特区政策”。

数据显示,迄今南开共有20人通过“人才特区”获得聘用。其中两人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1人入选天津市千人计划长期项目,4人入选天津市青年千人计划,1人入选国家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资助,数人已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过论文。

“虽然我们现在讲人才‘特’区,但我们希望将来它不再是特区,而是普遍实行的一种机制,能够推广到全校中。对此,我们有信心。”佟家栋说。

作为这项改革的直接受益人,梁广鑫老师如今正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科研有了一定积累之后,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说到底,我还是一名教师,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享受教学漫长过程中的乐趣。”(记者 张国 通讯员 吴军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01月28日,第3版)

辽宁科大：一所三线城市大学靠什么汇聚人才

全国的人才蜂拥北上广，辽宁人才扎堆沈阳、大连。坐落于三线城市鞍山的辽宁科技大学，在沈阳和大连两个“大学群”的夹击之下，靠什么来吸引人才，又靠什么留住人才？

特色立校，错位竞争 发挥寸之所长

鞍山虽是一个三线城市，但它位于辽东半岛城市群中部，坐镇本溪、丹东、营口、辽阳、盘锦等工业城市中间，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鞍钢，曾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1949年至1953年，为恢复鞍钢生产，国家从全国各地派到鞍钢的干部有7306人，其中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500余人，被称为“五百罗汉”。

正是依托这样的背景，辽宁科技大学借力发力，谋求自身发展，提出“校企融合，共兴共荣”理念，通过“产学研”合作，共享智力和人才资源，为中国各大钢铁企业培养大批中坚力量，被誉为“冶金工程师的摇篮”。

进入新世纪，就在许多高校纷纷攀高结贵、贪大求全，逐渐失去自身特色的时候，辽宁科技大学仍然坚守着它的本初宗旨不变。先后与鞍钢等企业共建研发中心10余个，共同承担和开发包括国家“863”项目在内的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百余项。

学校为什么要与企业搞合作？辽宁科技大学校长孙秋柏说，是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需要，也是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在与企业合作中，科技成果不能一次性转让，为了建立长期的利益链，只能以成果为纽带，建立研发中心和实验中心。”

出台政策，搭建平台 让每个人尽展其才

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可以从各地一次性调来几千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再也不能靠上级指派，而应当是自己吸引。辽宁科技大学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辽宁科技大学虽然只是一所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却拥有国家级的大学科技园。2010年，这样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全国只有64个。”辽宁科技大学宣传部部长杜微介绍，科技园拥有4处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用房总面积24864平方米；通过自建、与企业共建等方式创办34个科技创新机构，按照不同学科方向融合成5个技术创新平台；在园企业73户，在孵企业64户，2012年园区企业技工贸总收入8.75亿元。

有了硬件平台，还要有吸引人才的“软件条件”，在辽宁科技大学出台的《引进人才的相关待遇》里，记者看到了“一事一议”“按需支持”“就高不就低”等关键词，既让人感觉到学校求贤若渴的心情，也让人感受到校领导班子的真诚。他们以“用武之地”做绣球，搭建吸引人才的“蓄水池”，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广发“招贤榜”。

过去，科技人员到企业兼职会被斥为“脚踏两只船”，若再额外“收取报酬”，更有被“治罪”的风险。在辽宁科技大学，教师到企业兼职非但不会被“治罪”，还会受到鼓励。

学校招聘人才，也给房子，也给安家费，但是更重要的是，学校鼓励人才带着自己的科技成

果自己“找婆家”。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崔文华、老教授丁丕显和吴庆洪等人，作为聚龙公司的项目研发骨干，在企业上市过程中，都作为技术持有人得到回报。其中，崔文华、丁丕显各持29万股，市值3000万元。

栽下梧桐，孔雀自来 三线城市吸引一流人才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崔文华，毕业后落户辽宁科技大学，在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任教，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技研发工作。兼任科大聚龙集团技术中心总经理后，更是发挥其所长，带领科研人员瞄准市场空白，刻苦攻关，在现金纸币鉴伪、自动识别、快速处理、现金支付产品等关键技术方面，成功地打破了国外垄断。

崔文华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很快，但与之配套的办公设备却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尤其是高端金融设备，长期被西方几个国家垄断。当时，国内进口一台纸币清分机要200万元。聚龙公司打破国外垄断后，国内银行购买一台清分机只需10万元左右。聚龙公司也凭借其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良好的市场业绩，成为鞍山第一家创业板上市企业。

辽宁科技大学人事处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该校共引进全日制硕士以上学位人员150余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人员50余人（含留学归国人员6人），引进高层次专家、学者8人。

鞍山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陷“东北现象”泥潭：大批企业停工、大批人才“孔雀东南飞”。虽然政府也曾推出“优惠政策引人、优厚待遇留人”等措施，然而由于缺乏产业的平台，许多人还是决绝地离去，虽有个别“人”留了下来，但“才”却没有了施展的天地，最后也“泯然众人矣”。辽宁科技大学的“平台引人”策略，切合了知识分子对事业的追求，因而吸引了大批人才“孔雀东北飞”。世界知名的超临界专业技术专家爱德华·拉姆齐，2006年移居鞍山，应聘到辽宁科技大学任教，2012年入选国家第八批“外专千人计划”。从澳大利亚学成归来的余江龙博士，2011年落户辽宁科大，并担任化工学院院长。余江龙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能给自己专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就是最适合自己、最值得自己辛勤耕耘的土壤。”（记者 毕玉才 特约记者 刘勇）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2月22日，第11版）



国际视野

中美高等教育教学策略对比分析

2013年11月,新一届“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s)”公布。获奖者都为青年,他们将有机会得到全额资助,赴牛津大学学习两至三年。该奖被视为全球最富盛名的青年科研奖之一。本次全美32名获奖者中有6名来自哈佛大学。至此,该校共有348位罗德学者。这些哈佛获奖者来自不同专业。以今年为例:6名得主分别主修医学、心理学、性别研究和免疫学等多个学科。这较为突出地证明了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名校在教学方面所取得的规律性经验。

与这些大学相比,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日益体现出共通性。例如,强调创新精神、素质培养和树立健康的人生观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根据《纲要》部署,国家组织开展了各类型教育改革试点,全国高校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此为背景,从对比的角度,分析他者在教学策略方面的优势和经验有助于更好地反思并解决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本文以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为代表性案例,从教学目的和模式两个方面对其教学策略进行剖析。

中美高等教育教学目的对比分析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教学目的集中体现了一所高校、教育系统,乃至一个国家对教育的理解,对人才的定义,以及对教育工作者的核心要求。长期以来,国内对“中国高等教育目的”一直充满争论。由于欠缺可操作性的明确定义,中国高校的教学改革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明确概念,也成为影响我国教育国际形象传播的障碍之一。

在这方面,哈佛大学(以下简称哈佛)历经500年探索已逐步确立了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所有学科层面,哈佛注重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1938年,哈佛进行了一项长期实验以总结如何创造幸福和有回报的生活。268名哈佛学生接受了长达约75年的调查。2012年,年届九旬的参加者们以自身经历验证了何为科学的幸福理念。对此,哈佛心理学教授维兰特(George Valliant)认为,“这次实验表明幸福就是去爱”!现在,培养学生科学的生活态度已成为哈佛教育的基本准则。这也反映出大获成功的课程所具有的共性。例如,泰本(Tal Ben-Shahar)博士开设的两门课程“积极心理学”和“领袖心理学”分别排名“哈佛最受欢迎课程”第一名和第三名。他为此撰写的《幸福的方法》解释了课程成功主要在于切中

高等教育教学目的的本位。

2. 在具体学科层面, 哈佛强调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哈佛女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阐释历史, 塑造未来, 界定值得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对于世界的关切与责任意识是哈佛各学科必须秉持的教育宗旨。因此, 全校院系都在专业教育中融入了对本领域杰出人物的精神境界的讨论。人文主义思想成为学生们体会最深刻的“专业素养”。以 2013 年的 6 位罗德学者为例, 虽然来自不同专业, 但他们拥有相同的理想, 那就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通过分析 6 名学生的获奖感言, 可以发现“人类”“世界”“未来”“感恩”和“责任”成为这些青年学子们对“成功”要素的解读。

3. 在学生个体层面, 哈佛关注健全人格的培养

很多时候, 品格而不是成绩或者社会活动能力才是核心评价指标。哈佛学生大多来自美国特权家庭(America's most privileged families)。然而, 这并不等于对人格品质的教育可以放松。以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柯普拉斯(Martin Karplus)教授为例: 他的导师, 1954 年化学奖和 1962 年和平奖得主普林(Linus Pauling)当年之所以看好柯普拉斯, 是因为他“谦逊、有活力、有想象力, 而且有自己的视角”。在分析柯普拉斯的成功经验时, 哈佛的焦点不是该研究的内容、贡献和意义, 甚至不是获奖者如何辛苦, 而是提炼其品格中的闪光点以及对青年学生的启示。柯普拉斯的成功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这并非单纯源于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律, 反而是其选题, 特别是理念的不被认同。所以, 柯普拉斯指出, “我的化学同行认为我的研究是浪费时间, 所以, 我的故事可以给青年化学家带来的经验是‘坚持并且坚信自己的远见, 哪怕它与现有的范式是抵触的, 原创力和努力工作是一件重要的事’”。

与哈佛等国际著名大学相比, 我国对高等教育目的的阐释在立意方面尚需提升高度, 否则会影响对大学精神的解读。国内对“素质教育”已广泛认同, 由此而来的教学改革或优秀人物不断涌现。然而, 在定义时, 未能将“素质”与国际视野和人生本质规律相联系; 在具体操作中, 没有将“素质”系统地与不同层面的教学相匹配。因此, 学校、教师和学生更多地感受是教学的“外壳”变化很大, 但“内涵”鲜有亮点式突破。在全球化时代, 我国高等教育立意的局限性甚至会造成对中国教育形象的误读。例如: 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在 2012 年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 edX, 旨在为所有学习者提供免费教育。在解释本活动的宗旨时, 国外大学很自然地上升到人文关怀的高度。2013 年 5 月,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也加入该计划。这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为国家和世界作出的责任贡献。有些遗憾的是这个良好的立意仅被定位在“竞争”和“中国走出去”。有关部门在接受采访时说: “参加 edX 是为了提升我们各学院的国际影响力”。

美国高等教育之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反映了教学工作重点的部署与执行。在新的国家发展环境下, 教学模式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课程建设, 甚至课堂教学形式的改革, 它应该具备更加丰富的内涵。在这方面, 哈佛等美国大学近年来为应对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对教学模式作出的重要改革值得研究。这些措施的核心特点是较为生动地体现了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务实性创新。

在创新性方面, 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内容创新”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肯塔基州最大的私立大学坎伯兰大学(University of

Cumberlands)2010年针对国内经济不景气而推出的新教学模式——“爱国者学者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热爱学习且成绩优秀的本科生可34个月毕业。这些学生在大一和大二时,每个夏天在线完成21小时至24小时的坎伯兰公共课教学,获30个学分。此外,每学期平均修够16.33学时。这项计划有助于学生在学期的正常学习中更加集中地专攻所修主业。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可以选修坎伯兰大学课程。因此,入学时,他们是有备而来,并且获得一个“跳跃式开端”。三年毕业的模式可以让学生节省高等教育的时间与经济成本。然而,这项制度创新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一方面践行了“让改革切实奏效”的精神,因为“世界在改变,变得更加艰难,更富挑战性,对于成本浪费和‘撞大运’变得更加难以原谅”;另一方面,新教学模式能够更加激发高中生的学习热情与责任意识。例如,受益于该项目的学生都表示在高中阶段就开始兼修大学课程,任务虽增多了,但看到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为父母节省了高昂学费,感到很幸福。加入计划需要勤奋努力,但回报超出了付出,这个收获是一辈子的骄傲。研究显示,这类学生入学后更能承担挑战,人生态度也更积极。他们的表现反映出制度创新的潜力与意义。

就教学模式的“内容创新”而言,这是所有高校都面临的课题。随着社会与行业环境的不断变化,很多毕业生就业时会被雇主抱怨是“百年历史的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那么如何求得,特别是赢得教学模式的“变”?在此,哈佛法学院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2006年,法学院课程改革审核委员会着手改革现有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思考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而不仅是学术思路”。在充分征求从业者意见的情况下,学院逐步确定了改革的总体原则,那就是要给自己非常聪颖且有进取目标的学生们提供服务,让他们更好地利用大学时光。新教学模式的理念在延续原有的“案例式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纳入“解决问题型教学技巧”。学生从入学起,就被推动在学习各种法律条文的同时,掌握实际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技巧。毕业生需具备的素质是拥有良好法律学术基础,同时善于处理不同问题,如资产负债表、市场营销与管理等,最重要的是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考能力。

综上所述,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高校在教学模式改革方面能够得到普遍认可主要在于贯穿了两个原则:首先,改革不是“革命”,不等于彻底否定数代人探索和总结出的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坎伯兰大学教学模式改革取得成功,其基础主要在于坚持以“勤奋”与“责任感”作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的首要标准。因此,改革的思路是让教学形式务实地适应国家环境的变化以更好地惠及民众。然而,新模式只能推动而非削弱高等教育应坚守的传统精神。其次,改革必须有较为完善的保障体系。哈佛法学院的教学模式改革拥有两个支持来源。一个是学院课程改革审核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院长任命,由8名教师组成,任期两年半。另一个是学院合作单位,如法律公司、律师、法官、非盈利性机构、法律制定部门和商学院与公共政策学院等学术机构以及学生和校友等。这些单位负责提供专业建议。在调研时,直接回答“哈佛法学院应该怎么教学生”。由此可见,创新需要先明确所服务的高等教育教学目标是什么,在这个框架下摸索相应的新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创新需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且充分熟悉和探讨,才能有效规避因过于倚重内部意见而造成的“井底之蛙”现象,或者完全由社会力量主导一线教学而导致“水土不服”。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我国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指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是为国家与



民族大业服务，也是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可见，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策略在本质上与包括哈佛等国际知名大学在内的全世界的高校都是一致的。

同样地，中国高等教育当前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乃至全球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李克强总理在 2013 年 12 月 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治贫先重教，认为“发展教育是减贫脱贫的根本之举”。那么，如何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教学策略，既能维护和传承优秀的教育价值观，同时又能够有效节约时间与经济成本？在这些方面中外交流一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作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高等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不容小觑。如何实现理想的教育目标，教学策略的制定与不断完善是立足之本。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或许很复杂，但根本道理比较简单，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一个民族的财富与竞争力来自其所提供的教育的能力，吸引并留住那些更聪明和学习更快的学生们”！（作者：刘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来源：《北京教育》2014 年第 4 期）